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廖信林¹ 杨正源² 王立勇³

(1. 安徽财经大学, 安徽 蚌埠 233030; 2.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3.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98)

摘要: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08—2019年数据, 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 总体上, 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 文化距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新的证据, 并从政府与企业双重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对外直接投资; 营商环境; 文化距离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60(2024)03-0040-13

DOI: 10.19337/j.cnki.34-1093/f.2024.03.004

一、问题提出

2013年, 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 先后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后文简称“一带一路”倡议)。二十大报告强调,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十多年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实体经济领域对外投资稳定增长。“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裴长洪, 2023)。截至2021年末, 中国已与145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首选地; 中国与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2700亿美元, 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 为沿线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 让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①。

是什么促使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多数研究认为, 国家的特点, 包括地理范围、政治环境、经济发展程度、文化和制度环境等, 有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Chen et al., 2020; Huang, 2019; 金刚等, 2019; 周茂等, 2023)。制度环境是一国独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和文化体系, 国家间制度的差异构成了制度距离。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指出, 母国OFDI偏好制度质量更好的国家, 即制度距离负向影响OFDI(Trapczynski et al., 2020; 王碧珺等, 2023)。

收稿日期: 2022-01-18

作者简介: 廖信林(1979—), 男, 江西赣州人,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杨正源(2000—), 男, 江苏盐城人,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王立勇(1976—), 男, 山东海阳人,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安徽省社科联攻关研究类课题“安徽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2021CX038); 盐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研究院开放课题“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效应测度与实现路径研究”(23YB04);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时代贵州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与保障政策研究”(19GZYB02)。

^① https://www.gov.cn/xinwen/2022-01/19/content_5669215.htm.

具体来看,制度距离对中国 OFDI 的影响存在发达国家制度偏好与发展中国家制度风险偏好(王金波,2020;谢娜,2020)。Ma et al.(2023)以 2012—2017 年中国 1733 家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指出,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力量共同影响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但是 Hitt(2016)和 Tan et al.(2023)的研究均表明,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言,正式的监管因素可能比东道国的文化和认知变量“更重要”。无论如何,法律和正式规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包含并表达了社会的基本规范、偏好、历史和文化(Wu et al.,2017)。Contractor et al.(2020)利用世界银行 189 个经济体的数据研究发现,具有更强的合同执行能力和更有效的国际贸易法规的经济体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上述研究多是从宏观层面来研究东道国制度与母国 OFDI 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考虑到微观层面的涉及东道国企业本身的经营环境与母国 OFDI 之间的关系。

作为制度环境的一部分,营商环境不仅关系到投资效率和风险,也影响着投资目的地和投资模式的选择(曾慧等,2023),从而显著影响着一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生态系统,营商环境指企业在准入、创业、生产经营、投融资、创新等活动中所面临的外部环境(陈升等,2021)。外部环境的优化,特别是在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方面的改进,为企业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投资条件和更高的操作效率(Bah et al.,2015;张建民等,2023)。较好的营商环境能够降低企业的负担,为企业的生产运营创造良好的环境,而恶劣的营商环境则会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蔡晓珊(2022)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发现塑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吸引 FDI,外资企业对大湾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政务环境以及金融服务等营商环境要素更为敏感。刘军等(2020)以 2006—2018 年 139 个发展中国家的 13.59 万家企业的生产经营数据作为实证样本,发现优化营商环境减弱了外资企业的市场寻求型 FDI 动机,但是增强了效率寻求型 FDI 动机。

关于营商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现有文献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资源禀赋不同,外商投资的动机存在差异,营商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也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但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资本、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等要素禀赋差异较大且营商环境各不相同。那么,东道国营商环境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何种影响?是否因地理区位、行业特征或东道国收入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培育引资新优势的过程中制定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措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现有研究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时并未达成一致结论。陈升等(2021)认为沿线发展中国家的营商环境对中国 OFDI 有较强的吸引力,而发达国家则与此相反。姜松等(2021)认为营商环境改善并不一定会引致 FDI 流入增加。曾慧等(2021)则认为沿线国家营商环境与中国 OFDI 呈倒“U”形关系,即沿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营商环境可以显著吸引中国 OFDI,而沿线发达国家营商环境与中国 OFDI 为不显著的负向关系。

鉴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两点:(1)传统文献集中于单一要素禀赋或者制度环境等展开研究,本文在现有文献的支撑下,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文化距离对二者的调节效应,拓展了已有文献的研究。(2)实证上,利用古代丝绸之路途经城市与两国首都间地理距离作为工具变量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较好地解决了内生性问题;通过区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理区位、发展程度以及营商环境子指标,对子样本进行细分检验,进一步识别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样本中的差异性效应。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好的营商环境能够引致高端要素资源的流向和集聚。一般而言,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沉没成本,具有高技术或长期战略目标的跨国公司对营商环境较为敏感,为避免技术知识被侵权,会将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经营的诚信社会环境以及企业经营法治环境等作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不难发现,良好的营

商环境或许可以通过吸引高质量外资有效弥补传统引资政策的失灵(金刚等,2019)。世界投资报告(2018)也指出,优惠激励措施的有效性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总体投资环境,只有在作为解决投资环境限制的更广泛方法的一部分时,优惠激励措施才真正有效。Bah et al.(2015)通过修正后一般均衡模型评估了营商环境的各种影响,发现监管的缺失、基础设施的落后、腐败和犯罪以及较低的金融发展导致了非洲较低的产出和生产率。Alfalih et al.(2020)以石油资源丰富的阿拉伯国家为例,发现市场规模、实际汇率和法律秩序对外国直接投资都有积极影响。这再一次证实了优化营商环境会消除不合理的成本、风险和竞争障碍从而鼓励外国企业进行投资。

就目前的国际直接投资而言,各国可以通过改善投资便利化、协调国家间发展计划和政策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现有研究表明,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关键因素(Chen et al., 2020;于津平等,2023)。不利的东道国的税制、资本准入限制以及资源开放程度等均会对外资企业的经营便利和运营成本产生负向影响,而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合同履行效率、开办企业便利度以及获得施工许可便利度能够增加企业投资机会,降低投资损失。“一带一路”政策提供了大量激励措施,如简化行政程序和放松资本管制,这有助于企业向“一带一路”指定国家投资。积极响应外向型 FDI 政策号召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机构支持获得优惠待遇,帮助它们规避与国际扩张相关的交易风险和不确定性(Wang et al.,2020)。目标国营商环境越好,企业日常的经营成本越可控,手续办理越便捷,企业的生产运作越高效,越有利于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耿伟等,2020)。完善的营商环境促使社会经济朝着自由竞争的方向发展,有效促进要素资源的充分流动及合理配置。而企业家为实现资源配置的便利化和自由化,会顺应市场的发展要求,对要素资源进行合理投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从而催化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姜松等,2021)。但也有文献发现营商环境对 FDI 的促进作用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以及非 OECD 国家(Corcoran et al.,2015)。因此,这种影响会因为研究对象、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为此,本文提出:

假说 1: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营商环境正向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效应存在国家异质性。

(二)调节因素

一些文献证明了文化距离能够通过交易成本、消费偏好两个路径阻碍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就是文化距离与双边贸易或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Lucke et al.,2016;管宁等,2022)。一方面,Gokmen(2017)认为文化差异引起的语言不通、信息不对称、信任度低等问题提高了贸易成本,抑制了贸易量。通常而言,文化距离大的两个国家,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严重,沟通难度更大,导致一方难以理解和预测对方的行为,双方的信任度以及合作关系的建立更加困难,贸易双方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更高,因此,交易将受到阻碍(Gorodnichenko et al.,2024)。也就是说,如果东道国与母国文化距离较小,那么二者具有相似的经营理念,遵守共同的交易理念的同时将合作与非冲突贯穿于整个过程,这不仅能够增进默契,减少技术对接与转移的成本与不确定性,同时也能够规避对外直接投资中各个阶段的摩擦与冲突(苏屹等,2023)。

另一方面,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因子有助于贸易双方建立信任关系,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误解。Zheng et al.(2022)认为文化距离大导致沟通难度加大,不利于贸易的发起和完成。较大的文化差异导致消费习惯和需求偏好差异较大,也可能会抑制两国的贸易往来。郭新茹等(2018)认为由于消费习惯的持续存在,消费者可能会更偏好国内产品或是同本国文化相近的产品,文化差异越大,各国消费者间偏好的相似性就越低,需求重叠就会越小,那么贸易的可能性就越小。顾江等(2019)认为文化较为相似的两个国家的居民的消费习惯、消费偏好也较为类似,这促进了两国的贸易往来。例如,饮食习惯相近的国家间农产品商贸更为频繁,如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都喜食稻米等食物,所以国家间农产品商贸发展势头更为强劲,而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的产品有天然的劣势(方慧等,2018)。

为此,本文提出:

假设 2:东道国与母国文化距离对营商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三、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一) 模型设计

1. 基准回归模型

参照陈升等(2021)、张建民等(2023),在投资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东道国同中国的营商环境等因素,设计如下基准模型:

$$OFDI_{it} = \alpha_0 + \alpha_1 BET_{it} + \alpha_2 Z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OFDI_{it}为被解释变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BET_{it}为核心解释变量东道国营商环境;Z_{it}表示控制变量集; μ_i 表示国家固定效应, δ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表示随机误差项。

2. 系统 GMM 模型

较之差分 GMM 模型,系统 GMM 模型可以提高估计的效率,减少由于使用一阶差分 GMM 估计方法带来的潜在偏误和不精确性,并且可以估计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的系数。因此,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参考现有研究(姚辉斌等,2021),考虑到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自身可能存在滞后影响效应,模型中增加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OFDI_{it-1}),进而建立系统 GMM 模型:

$$OFDI_{it} = \alpha_0 + \alpha_1 OFDI_{it-1} + \alpha_2 BET_{it} + \alpha_3 Z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3. 调节效应

为了验证文化距离的调节作用,参照耿伟等(2020),引入营商环境与文化距离的交互项(BET × CUD):

$$OFDI_{it} = \alpha_0 + \alpha_1 BET_{it} + \alpha_2 BET_{it} \times CUD_{ij} + \alpha_3 Z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二)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的存量。在测算过程中,首先以 2000 年为基期的 GDP 平减指数消除通胀因素,然后用年度平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是东道国营商环境(BET)。参考世界银行营商环境项目组的方法对其进行测算。由于获得电力便利度从 2010 才开始更新,因此选取营商环境的其他九个子指标来衡量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发展环境(王正新等,2019),包括衡量商业监管程序的开办企业得分(SOC)、施工许可得分(DCP)、登记财产得分(RP)、纳税得分(PT)、跨境贸易得分(TAB)、衡量法律保护的信贷保护得分(GC)、投资者保护得分(PMT)、执行合同得分(EC)和办理破产得分(RI)。

3. 控制变量

参照现有研究(Chen et al.,2020;于津平等,2023;张建民等,2023),选取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禀赋、基础设施水平、东道国政治风险、东道国与中国是否相邻等六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具体衡量方式见表 1。

4. 调节变量

文化距离通常被定义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共有的文化规范或价值观的差异程度(王进猛等,2020)。现有大多数文献采用 Hofstede(1980,2010)提出的国家文化维度模型的构建指标,并根据 Kogut et al.(1988)提出的测算方法对文化距离进行衡量。但是这种衡量方法的一个潜在问题是,它假设每个文化层面对文化距离上的不同国家或地区具有相同的影响。然而,文化冲突可能会随着全球化进程而不断减少。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本文参照已有文献(Zheng et al.,2022),对原有测算方法进行了修正:

$$CUD_{ij} = \left[\sum_{k=1}^5 (C^k_i - C^k_j)^2 / V_k \right] / 5 + 1 / T_{ji}$$

其中： CUD_{ij} 为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 C^k_i 和 C^k_j 分别为中国和东道国在第 K 个维度上的文化指数； V_k 表示样本国家第 K 维文化指数的方差； T_{ji} 代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年数，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东道国与中国文化距离越小。

“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中，部分国家的数据严重缺失，为了保证样本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多重插补法填补缺失数据，最终计入本文实证检验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40个。因此，本文实证研究将以2008—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本文未使用2019年后的数据，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自2020年以来，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可能会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影响。因此，不包含这一时期的数据有助于减少额外干扰因素的影响。

(三)描述性统计

在基准回归前，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详细结果见表1。为了降低变量间剧烈波动和异方差可能产生的影响，对除百分比、虚拟变量以外的所有自变量取自然对数处理。同时，为了探究各主要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排除多重共线性影响，本文对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分别进行了Pearson和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主要变量间相关系数相对较小，并没有表现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适合纳入回归方程中。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后续的一系列分析与探讨。为减少异常值对结果的干扰，本文对指标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

表 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数据来源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对外直接投资	OFDI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报告》	480	10.843	7.218	8.008	25.112
营商环境	BET	各子指标计算得	Doing Business 数据库	480	0.803	0.262	0.149	3.382
经济发展水平	GDP	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	WDI 数据库	480	8.234	1.146	6.065	11.561
自然资源禀赋	RESOUCE	东道国自然资源总租金占 GDP 的比重	WDI 数据库	480	0.357	0.273	0.047	0.428
劳动力禀赋	LABOR	东道国 15 岁以上劳动力总数	WDI 数据库	480	4.378	2.929	2.551	7.476
基础设施水平	IFD	基础设施发展指数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	480	1.897	0.719	1.595	2.043
东道国政治风险	RISK	世界银行治理指数(WGI)	WGI 数据库	480	3.034	0.746	1.753	6.398
是否相邻	NEAR	东道国与中国是否相邻	CPEII 数据库	480	0.127	0.328	0.000	1.000
文化距离	CUD	东道国和中国之间的文化距离	Hofstede (2010) 数据库	480	0.761	0.047	0.165	2.726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2报告了营商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回归结果。列(1)、(2)基于OLS模型讨论营商环境(BE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具体影响，BET的系数显著为正。列(3)、(4)是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BET与OFDI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说明中国企业倾向于到营商环境总体情况较好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为此，本文假说1初步得到验证。这一结论也与现有文献基本保持一致(Wang et al.,2020;蔡晓珊,2022;张建民 等,2023)。

为了进一步增强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基于营商环境的中位数作为分样本条件，进行分组回归。表2列(5)、(6)的结果表明，营商环境较好(前50%)的分样本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明显大于营商环境较差(后50%)的分样本，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再一次佐证了假说1。

从控制变量的结果来看，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GDP)显著为正，即东道国经济发展越好，市场规模越大，中国企业越倾向于对其进行直接投资(于津平等,2023)。从劳动力禀赋来看，传统中国企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但随着人力成本的逐年上升，部分制造企业选择将工厂搬

迁到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如缅甸、印度尼西亚、老挝和越南等国劳动力增速较快,可以满足制造业企业的生产要求(刘友金 等,2023;张晓涛 等,2019)。

值得注意的是,从自然资源禀赋(RESOUC)来看,本文的研究说明中国 OFDI 的区位选择并没有明显的自然资源寻求动机,有力地驳斥了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掠夺式开发自然资源行为”的观点(李俊久 等,2020)。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大部分用于交通、通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领域,这些投资转化成铁路、公路、发电厂,有效带动了当地劳动力就业。这一结果从正面回击了部分西方学者关于“一带一路”是新殖民主义的论调。正如马艳等(2020)所指出的那样,“一带一路”倡议和实践的本质是抵抗、限制和约束超额剩余价值在全球各国之间不平等的转移,是逆不平等性过程。“一带一路”倡议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有利于充分发挥各国比较优势,扩大利益汇合点,培育发展新动能(吕越 等,2022)。

表 2 列(7)汇报了系统 GMM 模型的回归结果。研究发现,滞后一期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L. OFDI)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其余各解释变量系数符号及其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进一步佐证了研究假说 1。为验证系统 GMM 的估计结果是否有效,本文基于 AR(1) 和 AR(2) 识别扰动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且使用 Sargan 检验来进行过度识别约束检验,相关检验结果均表明模型稳健。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OLS		固定效应模型		BET < 50%	BET > 50%	系统 GMM 模型
	(1)	(2)	(3)	(4)	(5)	(6)	(7)
BET	0.099*** (0.010)	0.043*** (0.009)	0.089*** (0.022)	0.062*** (0.020)	0.031 (0.036)	0.045** (0.017)	0.059*** (0.011)
L. OFDI							0.185*** (0.012)
GDP		0.252*** (0.010)		0.089*** (0.011)	0.115*** (0.018)	0.030*** (0.009)	0.142*** (0.026)
RESOUC		0.056* (0.030)		0.001 (0.002)	0.001 (0.002)	0.002 (0.004)	0.139* (0.079)
LABOR		0.137*** (0.007)		0.057* (0.030)	-0.015 (0.043)	0.083*** (0.022)	-0.188*** (0.011)
IFD		1.756*** (0.299)		0.364** (0.155)	0.461* (0.251)	0.040 (0.104)	0.167*** (0.006)
RISK		-0.172*** (0.024)		-0.106* (0.063)	-0.021 (0.096)	-0.168*** (0.053)	-0.207*** (0.000)
NEAR		0.005 (0.008)		0.003 (0.007)	0.001 (0.008)	0.001 (0.013)	0.039 (0.086)
_cons	0.020 (0.050)	-2.736*** (0.088)	0.072 (0.109)	-1.039*** (0.225)	-1.099*** (0.324)	-0.241 (0.213)	0.272** (0.068)
国家固定效应	NO	NO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NO	NO	YES	YES	YES	YES	YES
AR(1)							0.000
AR(2)							0.762
Sargan							0.179
N	480	480	480	480	240	240	440
adj. R ²	0.032	0.500	0.943	0.945	0.774	0.947	0.431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二)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变量

首先,将解释变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OFDI)替换为中国的 OFDI 流量(OFDI_t)。范建亭等(2021)认为双边贸易额中出现零值问题是不能忽视的。由于贸易额中有部分数字是零,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线性化的引力模型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为此,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采用泊松伪极

大似然估计法 (PPML) 再次对其进行估计 (吕建兴 等, 2022)。借鉴现有多数文献做法, 将该指标数据加 1 后再取自然对数进行检验。其次, 本文将营商环境替换为由美国传统基金会每年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 (BET2) (刘娟, 2019; 张建民 等, 2023)。该指数包含了商业自由度、贸易自由度、财政自由度、货币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五个维度, 得分越高表明经济制度环境越好。经济的开放自由是有效发挥市场机制的前提和基础, 是市场效率和市场制度完善的充分体现, 因此可以作为营商环境的替代变量。表 3 列 (1) ~ (3) 的结果表明, 衡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营商环境指标的不同方法并不影响本文核心结论, 本文结论的可信性进一步得以增强。

2. 去除极端样本

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含多个地缘政治复杂地区, 政治发展水平对本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本文参照现有文献, 剔除了以色列、伊朗、也门、越南四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再检验。列 (4) 结果表明, 剔除变量后的模型检验结果与剔除前结果基本一致, 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且影响方向与基准回归结果相同。

3. 面板分位数

为了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我们采用了分位数回归进行比较。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 (OLS) 容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 而分位数回归可以更好地捕捉数据分布的尾部特征, 更不容易受极端值的影响 (Chernozhukov et al., 2022)。选定 Q25、Q50 和 Q75, 分别用于说明较低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中等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和较高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的结果如表 3 列 (5) ~ (7) 所示, 关键变量的符号方向与系数大小依然与基准回归基本保持一致, 且在所有分位数水平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再次增强了结果的可信度。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PPML	Ln(OFDI _{it} + 1)	OFDI	OFDI	Q25	Q50	Q75
	(1)	(2)	(3)	(4)	(5)	(6)	(7)
BET	0.135*** (0.015)	0.028*** (0.007)		0.222*** (0.024)	0.102** (0.031)	0.084*** (0.024)	0.067** (0.012)
BET2			0.163*** (0.011)				
_cons	1.189** (0.093)	0.271*** (0.012)	0.348*** (0.046)	0.761** (0.107)	2.162** (0.372)	2.196*** (0.053)	2.147** (0.43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80	480	480	432	480	480	480
adj. R ²	0.227	0.183	0.263	0.522	0.216	0.224	0.226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三) 内生性检验

以上稳健性检验虽证明了基准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且系统 GMM 模型已经缓解了部分内生性 (姚辉斌 等, 2021), 但回归检验仍可能面临内生性的问题。一方面,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能因具有较高水平的要素禀赋和营商环境而吸引中国对外投资, 而同时中国对其投资又进一步提高了当地的营商环境, 从而导致两者互为因果; 另一方面, 虽然本文已添加了一系列控制变量, 但仍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为此, 本文尝试引入合适的工具变量来处理。借鉴金刚等 (2019)、王桂军等 (2019), 采用中国首都北京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首都间的距离 (distance) 作为工具变量。从相关性来看, 由于古代交通不发达, 即使有着优秀的营商环境, 东道国政府也鼓励海外投资, 但是由于地理距离的客观限制, 古代中国只能与较近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保持较密切的经济联系。从外生性来看, 随着科技的发展, 距离阻碍不断被突破, 已不再是中国对外经贸交流的首要考虑因素, 其重要性已不断降低, 即与现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仅存在着较弱的相关性, 满足外生性要求。

此外,本文还根据肖建忠等(2021),选择古代丝绸之路途经城市^①(city_silk)作为第二个工具变量。从相关性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是以古代“丝绸之路”为依据提出的,故“一带一路”与古代“丝绸之路”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同时古代丝绸之路途经城市由经贸交流推动文化、宗教与政治等交流。各种交流相互结合,已经具备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基础。从外生性来看,丝绸之路始于汉代,而本文的样本为2008—2019年的国别样本,在时间上相差久远,因此不会直接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表4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列(1)、(2)中工具变量为Iv_distance,列(3)、(4)中工具变量为Iv_city_silk,列(5)、(6)中同时将Iv_distance和Iv_city_silk作为工具变量。上述模型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可以看出,实证结果与基准估计结果一致。对于原假设“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检验,LM统计量p值均为0.000,显著拒绝原假设;在工具变量弱识别的检验中,Wald F统计量大于Stock-Yogo弱识别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总体而言,以上检验证明了本文所选工具变量的合理性。

表4 内生性检验结果

	Iv_distance		Iv_city_silk		合并	
	(1)	(2)	(3)	(4)	(5)	(6)
BET		0.074*** (0.012)		0.183*** (0.034)		0.102*** (0.011)
Iv_distance	-0.405*** (0.062)				-0.143*** (0.014)	
Iv_city_silk			0.382*** (0.025)		0.275*** (0.03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KPrkLM		8.628***		33.114**		14.608***
KPrkWald F		87.169***		43.617***		31.492***
Stock-Yogo 10%		16.380		21.450		17.590
N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五、进一步研究

(一)异质性检验

1. 地理区位异质性检验

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组成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天然地包含了陆上和海上两条线路(周茂等,2023)。“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地理、文化特征方面具有较强的异质性,为此本文把样本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18国)”子样本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2国)”子样本进行区域异质性检验^②。此外,根据沿线国家地理区位,考虑到由于俄蒙、南亚和中亚地区样本较少且与中国相邻,本文将三个区域合并为一个区域,样本国家分为中南亚及俄蒙地区(7国)、西亚地区(14国)、中东欧地区(14国)和东南亚地区(5国)。表5为异质性检验结果。

列(1)、(2)汇报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同沿线国家的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一带”和“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正向影响。进一步来看,相较于“一带”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促进效应在“一路”沿线国家表现得更强烈。可能的原因在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是大国博弈和竞争之地,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列(3)~(6)汇报了中南亚及俄蒙地区、西亚地区、中东欧地区和东南亚地区中不同国家的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上述四个地区表现各不相同。

① 古代“丝绸之路”途径城市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所辖城市与广州、泉州、宁波等。

② 篇幅所限,文中未列示异质性分类具体国家名单,留存备索。下同。

同,东南亚区域的主要风险是沿线地缘政治博弈风险和美国亚太战略冲突风险,西亚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种族结构使其成为世界局势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而且鲜明的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会使外部投资者的受欢迎程度下降(刘家国 等,2020)。但是这些地区同样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适度的生产能力,因此在市场方面更能够吸引跨国公司。

表 5 地理区位异质性检验结果

	“丝绸之路经济带”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中南亚及俄蒙地区	西亚地区	中东欧地区	东南亚地区
	(1)	(2)	(3)	(4)	(5)	(6)
BET	0.102*** (0.025)	0.087*** (0.018)	0.130** (0.066)	0.015** (0.007)	0.007** (0.004)	0.180*** (0.012)
_cons	0.294*** (0.008)	0.418*** (0.004)	0.536*** (0.062)	0.804 (0.493)	0.649** (0.028)	0.616*** (0.08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16	264	84	168	168	60
adj. R ²	0.506	0.324	0.476	0.172	0.476	0.172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2. 国家发展程度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水平不尽相同,本文参考联合国 2018 年《人类发展指数报告》与 Chen et al.(2020)的研究,将 40 个样本国家分为发达国家(11 个)、发展中国家(18 个)、欠发达国家(11 个)。参照李光勤等(2023),将人均收入小于 6000 美元的国家确定为低收入国家(7 个),人均收入 6000~12000 美元的国家确定为中等收入国家(18 个),人均收入大于 12000 美元的国家确定为高收入国家(15 个)。表 6 汇报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情况异质性检验结果。

表 6 国家发展程度异质性检验结果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欠发达国家	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
	(1)	(2)	(3)	(4)	(5)	(6)
BET	0.145 (0.164)	0.163*** (0.026)	0.139* (0.079)	0.325* (0.170)	0.094** (0.023)	0.056* (0.030)
_cons	1.452** (0.028)	1.408*** (0.032)	2.475*** (0.097)	2.543*** (0.017)	2.338** (0.018)	2.448*** (0.01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32	228	120	180	216	84
adj. R ²	0.506	0.327	0.476	0.282	0.246	0.652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由表 6 可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这类国家的营商环境系数均为正,但并不显著或仅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营商环境良好、经济政治制度较为完善、社会较为稳定的发达国家的投资市场多数早已被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仅有的少量投资空间也面临全球各国的激烈竞争,中国的比较优势并不突出(陈升 等,2021)。同时,营商环境较好的发达国家往往具备健全的法律制度,法律监管较为严格,自然会对外来投资有较多的限制,由此导致中国企业前往投资的动力并不强(Wang et al.,2020)。发展中国家的营商环境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有着一定距离,同时劳动力充足且成本低廉,中国有充裕的资本与意愿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其发展潜力。欠发达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营商环境的系数也是仅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这可能是由于转型中的国家形势不够稳定,经济发展动力匮乏,缺乏优质的营商环境,由此产生的显性成本及隐性成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张建民 等,2023)。

3. 营商环境子指标细分检验

基准回归部分分析了东道国整体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由于不同营商环境子指标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不同,本文还从商业监管和法律保护两个维度对营商环境的9个子指标进行分类考察(Huang,2019)。

表7汇报了回归结果。列(1)~(5)是衡量商业监管的5个指标,其中开办企业便利度(SOC)、施工许可便利度(DCP)和登记财产(RP)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开办企业和办理施工许可的便利程度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选择有着积极正面作用。纳税便利度(PT)和跨境贸易便利度(TAB)的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政治局势不稳定,相应的商业监管环境可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耿伟等,2020)。

列(6)~(9)检验了东道国法律保护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信贷保护便利度(GC)和办理破产(RI)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正向显著,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好,完善的法律保护程序能够有效促进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但是投资者保护(PMI)却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与王正新等(2019)研究结果一致,说明东道国本土企业的利益会因为拥有强大资本实力的外资企业进入而难以获得更多的投资保护和优惠政策,本土企业的不满情绪可能会转化为投资风险。而执行合同便利度(EC)对中国企业的投资选择有着正向影响,但是不显著。实证结果说明,中国企业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更倾向于选择政治风险低、法律保护高的国家,完善的信贷保护、投资者保护、办理破产、登记财产等手续能够有效促进中国企业投资的增加。

表7 商业监管和法律监管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商业监管					法律保护			
	SOC	DCP	RP	PT	TAB	GC	PMI	EC	RI
	(1)	(2)	(3)	(4)	(5)	(6)	(7)	(8)	(9)
BET	1.532*** (0.296)	0.504*** (0.031)	0.314*** (0.102)	-0.027 (0.306)	-1.171 (0.998)	0.632*** (0.099)	-0.212*** (0.061)	0.058 (0.159)	1.013*** (0.135)
_cons	-9.438*** (2.467)	-4.200** (1.023)	-0.310 (0.842)	-0.097*** (0.010)	1.725*** (0.462)	5.886*** (0.843)	5.786*** (0.841)	5.797*** (0.837)	6.605*** (0.82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adj. R ²	0.321	0.322	0.345	0.351	0.316	0.233	0.247	0.227	0.248

注:***、**、*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二) 调节变量

为了考察不同文化距离对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调节效应,本文一方面采用交互项予以检验,另一方面,将总样本分为东道国和母国文化距离远(CUD=0)以及东道国和母国文化距离近(CUD=1)两组。回归估计结果见表8。

从本文重点关注的交互项来看,营商环境的系数显著为正,文化距离和营商环境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文化距离对营商环境起到了一定的负向调节作用。而从列(2)、(3)的分组回归结果来看,在东道国和母国文化距离远(CUD=0)的样本组,营商环境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在东道国和母国文化距离近(CUD=1)的样本组,营商环境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验证了本文假说2,东道国与母国文化距离对营商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可能的解释是,在与母国文化距离更近的东道国生产经营,中国企业可以与拥有相似信仰、看法和认知过程的团队成员、客户、供应商互动,减少企业资源重组的复杂性和动态调整成本(管宁等,2022)。在与母国文化距离较远的东道国,企业需要适应当地文化、政治经济体制、教育、宗教和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增加了企业信息收集与交易成本,阻碍了企业转移和执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经营实践(李俊久等,2020)。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之间难以协调合作,导致对外直接投资时面临更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Zheng et al.,2022)。

表 8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OFDI	CUD = 0	CUD = 1
	(1)	(2)	(3)
BET	0.072*** (0.004)	0.125 (0.104)	0.184*** (0.045)
BET × CUD	-0.136*** (0.022)		
_cons	2.466** (0.199)	0.864 (0.777)	2.489*** (0.71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	480	480	480
adj. R ²	0.227	0.183	0.263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世界经济低迷不振的时代,将中国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实行全方位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本文从营商环境和文化距离的视角出发,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根据 2008—2019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数据,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距离对二者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

第一,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总体上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一结论经过替换变量、去除极端样本和分位数回归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采用古代丝绸之路途经城市和与两国首都间地理距离等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依然稳健。

第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相较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表现得更明显。同时,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效应在发展中国家以及中等收入国家更为强烈。此外,营商环境九个二级指标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在不同分类标准下表现出显著差异。

第三,东道国与母国文化距离对营商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二）政策建议

从政府层面来看,第一,加强合作交流。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应当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合作交流,通过首脑会晤、合作交流等活动,加强国与国之间的联系。第二,完善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为企业提供完善的服务,给予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简化办事流程;通过商务部网站、“一带一路”专题网站等相关网站,及时准确公布对外投资情况、东道国政治风险提示等,为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发展保驾护航,实现更好地“走出去”。

从企业层面来看,第一,优化投资布局。深入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资本、自然资源、劳动力等方面与中国的差异和营商环境水平,对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区域的国家进行针对性的投资。中国企业还可以通过构建区域间联动来充分发挥各国的优势资源,分工协作,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链深度融合,提升投资收益。第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时刻关注东道国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选择政治风险低、法律保护力度大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并且尽可能选择同中国签订了贸易协定的国家开展投资。

参考文献:

- 蔡晓珊. 2022. 粤港澳大湾区营商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J]. 国际经贸探索(12):101-114.
- 陈升, 过勇. 2021.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的实证研究[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3):78-105.
- 范建亭, 卢波. 2021. 中外领导人互访与双边贸易: 基于月度数据的经验分析[J]. 财经研究(3):155-169.
- 方慧, 赵甜. 2018. 文化差异影响农产品贸易吗?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考察[J]. 国际经贸探索(9):64-78, 137.
- 耿伟, 李亚楠. 2020. 东道国不确定性与中国 odi 二元边际: 兼论营商环境的调节效应[J]. 世界经济研究(4):107-119.
- 顾江, 任文龙. 2019. 孔子学院、文化距离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J]. 江苏社会科学(6):55-65.
- 管宁, 宋一森, 王凯旋, 等. 2022. 文化距离对中亚贸易的影响[J]. 管理学报(3):17-28.
- 郭新茹, 彭秋玲, 刘子琰. 2018. 文化距离、文化贸易壁垒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效应分析[J]. 江苏社会科学(6):106-115.
- 姜松, 周洁, 邱爽. 202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与 FDI: 动态效应与作用机制[J]. 财政科学(8):86-100.
- 金刚, 沈坤荣. 2019.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投资效应: 发展效应还是债务陷阱[J]. 中国工业经济(9):79-97.
- 李光勤, 储梦君, 牛雯琦. 2023. “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创新能力: 基于双重差分法的检验[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113-131.
- 李俊久, 丘俭裕, 何彬. 2020. 文化距离、制度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的实证研究[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20-134.
- 刘家国, 周锦霞, 郭君雨. 2020.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区域风险研究[J]. 国际商务研究(6):32-41.
- 刘娟. 2019. 东道国特征对中国 OFDI 影响的空间邻近效应: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数据分析[J]. 经济经纬(1):56-63.
- 刘军, 王长春. 2020. 优化营商环境与外资企业 FDI 动机: 市场寻求抑或效率寻求[J]. 财贸经济(1):65-79.
- 刘友金, 尹延钊. 202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共生适配性与产业转移路径选择[J]. 经济地理(9):101-110.
- 吕建兴, 张少华. 2022. 中国自由贸易区关税减让的进口贸易效应: 基于关税减让幅度和过渡期的视角[J]. 财经研究(11):139-153.
- 吕越, 马明会, 李杨. 2022. 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重大成就与经验[J]. 管理世界(10):44-55.
- 马艳, 李俊, 王琳. 2020. 论“一带一路”的逆不平等性: 驳中国“新殖民主义”质疑[J]. 世界经济(1):3-22.
- 裴长洪. 2023. “一带一路”倡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解读[J]. 南开经济研究(9):3-18.
- 苏屹, 郭稳, 孙笑明. 2023. 技术距离对跨国并购二元创新绩效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文化相似性的调节作用[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6):1668-1685.
- 王碧碧, 高恺琳. 2023. 制度距离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影响[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8):111-130.
- 王桂军, 卢潇潇. 2019.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升级[J]. 中国工业经济(3):43-61.
- 王金波. 2020. 制度距离、文化差异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权力因素: 基于 1980—2018 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J]. 当代亚太(2):40-74.
- 王进猛, 徐玉华, 易志高. 2020. 文化距离损害了外资企业绩效吗[J]. 财贸经济(2):115-131.
- 王正新, 周乾. 2019. 营商环境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J]. 财经论丛(9):42-52.
- 肖建忠, 肖雨彤, 施文雨. 2021.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能源投资的促进效应: 基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数据的三重差分检验[J]. 世界经济研究(7):107-119, 137.
- 谢娜. 2020.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基于制度距离差异的实证分析[J]. 宏观经济研究(2):112-130.
- 姚辉斌, 张亚斌. 2021. 要素禀赋差异、制度距离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的区位选择[J]. 经济经纬(1):66-74.
- 于津平, 葛纯宝. 2023. 贸易便利化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J]. 财贸研究(2):26-40.
- 曾慧, 乔柳玲, 贾丽娜, 等. 202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 OFDI 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国别差异视角[J]. 调研世界(2):38-45.
- 曾慧, 张蕾, 王皖黔. 202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评价与变化趋势分析[J]. 亚太经济(4):1-14.
- 张建民, 窦垚. 2023.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 OFDI: 基于双边政治关系的门槛效应分析[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97-108.
- 张晓涛, 刘亿, 杨翠. 2019. 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的区位选择: 基于产业承接能力与要素约束视角[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111-122, 222.
- 周茂, 武家辉, 李雨浓, 等. 2023. 共建“一带一路”与互联互通深化: 基于沿线国家间的视角[J]. 管理世界(11):1-21.
- ALFALIH A A, HADJ T B. 2020.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eterminants in an oil abundant host country: short and long-run approach for Saudi Arabia [J]. Resources Policy, 66:1-11.
- BAH E, FANG L. 2015. Impa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output and productivity in Afric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14:159-171.
- CHEN J, LIU Y S, LIU W. 2020.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and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61:101458.
- CHERNOZHUKOV V, FERNANDEZ-VAL I, MELLY B. 2022. Fast algorithms for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process [J]. Empirical Economics, 62(1):7-33.

- CONTRACTOR F J, DANGOL R, NURUZZAMAN N, et al. 2020. How do country regulations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imp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flows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9(2):101640.
- CORCORAN A, GILLANDERS R. 2015.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ease of doing business [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51(1):103–126.
- GOKMEN G. 2017.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impac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on trade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7:449–458.
- GORODNICHENKO Y, KUKHARSKYY B, ROLAND G. 2024. Cultural distance, firm boundaries, and global sourcing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66:103175.
- HITT M A. 2016.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J]. *Cross Cultural & Strategic Management*, 23(2):206–215.
- HOFSTEDE G. 1980. Motivation,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 do American theories apply abroad [J].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9(1):42–63.
- HOFSTEDE G, HILAL G D, MALVEZZI S, et al. 2010. Comparing regional cultures within a country: lessons from Brazil [J]. *Journal of Cross – Cultural Psychology*, 41(3):336–352.
- HUANG Y. 2019. Environmental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location choice of China's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11:14–26.
- KOGUT B, SINGH H. 1988.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3):411–432.
- LUCKE N, EICHLER S. 2016.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determinants [J]. *Applied Economics*, 48(11):935–956.
- MA P, CUI L, DONG M, et al. 2023. Government policy, filial piety,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13(3):620–646.
- TAN M, YANG D Y, YANG Q J. 2023. Institutional quality, asset specificity,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102845.
- TRAPCZYNSKI P, HALASZOVICH T F, PIASKOWSKA D. 2020. The role of perceived institutional distance in foreign ownership level decisions of new MNE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08:435–449.
- WANG Z X, LOU W Q, PEI L L. 2020. Evalua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conomy*, 26(6):1339–1365.
- WU Y G, SONG Y G, DENG G Y. 2017.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DI, and TFP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J].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53(9):2020–2038.
- ZHENG B, WANG Y, KAMAL M A, et al. 2022.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China's OFDI efficiency; fresh evidence from stochastic frontier gravity model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s*, 17(1):98–119.

Host Country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tries

LIAO Xinlin¹ YANG Zhengyuan² WANG Liyong³

(1.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2.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3.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98)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40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from 2008 to 2019, the modified gravity model of investment i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host countries and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n improved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e host country generally promotes China's OFDI.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re exists geographical and developmental heterogeneity in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China's OFDI among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cultural distance has a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influence of host country's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China's OFDI. Finally, this paper provides new evidence for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o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dual dimensions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perspectives.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usiness environment; cultural distance

(责任编辑 包婷婷)